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秩序？

□ 萌瑛

世界在前进，风险无处不在。我们之所以无法正确控制生活中最重要的风险，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用现有金融制度处置风险。迄今为止，几乎所有金融创新的焦点都局限于传统股票市场和其他融资市场。

2013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将自己关于风险管理的思考融入社会和经济的背景下，最新推出其经典著作《新金融秩序》。他认为通过积极的金融创新，社会的金融大众化程度能获得较大提高，我们的经济生活也能变得更加稳定和繁荣。

在《非理性繁荣》中，席勒曾指出股市所处的繁荣状态被过分夸大，股市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成为富人，更不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新金融秩序》不仅接续了《非理性繁荣》当中未尽的话题，也理顺了应该如何应对风险这个难题。席勒对人们如何误解风险的具体行为作了深度分析，并且引入了很多新观点印证这个问题。

新金融秩序“新”在哪里？我们正在迈入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席勒认为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经济不平等现象将得到根治，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各国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和新金融秩序的六大理论。在这个框架之下，能够运用金融创新保护民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六大理论的前三项主要针对私营领域，分别是保险业、融资市场和银行业。后三个主要是为政府行为设想的，需要政府通过税收、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推进。

除此之外书中还用大量笔墨陈述了如何结合现实，如何将这些观点开发出来并切实执行。

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启示是，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金融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金融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对于肩负促进经济转型重任的

金融领域，三中全会提纲挈领地提出了“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要求。现如今，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扩延表明，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未来唯有坚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进一步释放金融体系活力，才能有效分散金融风险，并为实体经济转型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对中国而言，开始积极创建系统的风险应对措施迫在眉睫。席勒在《新金融秩序》中系统论述了建立一个全新的风险管理基础架构的必要性和手段。因此，这本书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剂改革良药，为建立更加合理、科学的新金融体系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提供了绝佳参考。

《新金融秩序》包含了席勒毕生最重要的思想，它勾勒出了一幅未来美好社会的宏伟图景，以及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美好的图景。

《新金融秩序》

【美】罗伯特·席勒 著
中信出版社



《面具之道》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围绕着萨利希人的斯瓦赫威面具、努卡特人和夸夸特利人的赫威面具，逐一分析了三种面具的美学特征，并细致地解释和比较了与三种面具相关的神话故事，探究了它们产生的可能性原因。



《快逃，河马来了》
何林皮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在这本随笔集中，作者讲述寻找信仰、见证魔术等有趣的经历，发表对死亡、性爱分离、天才病和屈辱记忆等独特看法，并与读者探讨男闺蜜是否存在、浪漫抵抗力、失恋法则等爱情秘密。



《世界是对的，你也是》
钱砾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轻心理”+“私观点”，提示人们用平静、清醒的态度，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协助人们建立更理性、更有趣的认知体系，与自我、与世界愉快共处。



曹操分别在公元210年、214年、217年先后发布了三道求才令，网罗天下人才。中国历史上的求才令很多，但是像曹操这样，公然招聘不仁不孝之徒的，空前绝后。那么，曹操为什么要公开招聘道德败坏的人呢？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动机？

看到一个完整的曹操。曹操名法之治，和咱们今天提倡的法治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今天说的法治，是要有法必依。曹操的名法之治，反对司法随意，但是他反对的，是你不能够随便拿什么感情因素，什么道德良心作为你判案的标准。但是拿什么作为判别标准呢？是利益。

要法治还是要人治？这两者在曹操手里，只不过是两个工具而已，它是可以选择的。这就是法律的实用主义。从求才三令来看，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就看你不能够给我带来实际的利益，能带来，那你就是人才；不能，那你道德再高尚也没有用。这就是法律的实用主义，法律的工具主义。法律的实用主义，带来的恶果就一定是道德的虚无主义。

《黑白曹操》
秦涛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现代世界的诞生

□ 文景

《现代世界的诞生》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麦克法兰以数十年来潜心欧美亚澳等文明间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将自己毕生索解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集成。

延续早年《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这部革命性著作中的观点，麦克法兰以翔实的史料，颠覆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彭慕兰等思想家和学者关于旧制度与现代世界“大分流”的经典理论，将现代世界的源头上溯至12-18世纪工业化的英国与勤业化的欧亚大陆之间的分道扬镳；并对现代性的本质和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那就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或曰宗教)等领域的彻底分立与组合。

麦克法兰以最古老的现代国家英格兰为例，通过描述英格兰社会方方面面的独特性，丝丝入扣地剖解开启现代性大门的每一把钥匙及其之间的关系。他希望这幅关于“英格兰奇迹”的比较性画面，可以帮助中国读者理解西方的历史与中国的现状，思考如何在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解决最棘手的“社会凝聚”问题。

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在针对《现代世界的诞生》的评议文章中指出“麦克法兰教授的一些观点也有推至极端之嫌，或者说，具有‘片面的深刻’，无疑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但30多年来，麦克法兰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并借此在现代性议题上打开了一片新世界。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他强调“作为第一个步入现代世界的特殊案例，英格兰是一系列偶然事件

或机遇碰撞与组合的结果，但仍可为其他国家提供许多借鉴。”有书评人指出，由于英格兰“曾是世界上唯一‘逃离’了农耕桎梏的国家”，因此毫无疑问，“英格兰的奇迹”正是造就“现代世界”的源头。

本书内容脱胎于麦克法兰教授2011年受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邀在清华园所作“王国维纪念讲座”。“王国维纪念讲座”是清华国学院创办的“三大纪念讲座”之一，另外还有“梁启超纪念讲座”和“陈寅恪纪念讲座”，分别讲授研讨“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思想与宗教”、“边疆民族史”等课题，以追念并继承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三大导师的传统。讲座同时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对话和评议，以体现学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间性。其成果汇集为“讲学社丛书”，以期为社会提供一个文化交锋的鲜活案例。

《现代世界的诞生》
【英】麦克法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速读

曹操招聘为何求才不求德

□ 妹宏 整理

在乱世之中想要拼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有人才。曹操分别在公元210年、214年、217年先后发布了三道求才令，网罗天下人才。东汉时期，统治者用人往往首先会看重一个人的德行，然而曹操却公然将一批道德败坏、不仁不义之輩招纳到自己的麾下。曹操到底有着怎样的用意？在用人问题上，他又有着怎样独特的智慧呢？

不仁不孝？我看就是人才

东汉末年可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看重道德的一个时代，但实际上是道德形式主义盛行。由于道德的形式化，“以德取士”的选官用人制度已经难以挑选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曹操意识到了旧有制度的弊端，于是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不拘一格地招纳天下英雄。

公元210年，曹操下了第一道求才令，向全社会公开招聘杰出人才，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第一道求才令里面连续追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那齐桓公为什么可以称霸呢？就是因为他任用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管仲。管仲的能力非常突出，但是他的道德品质方面却很有问题，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非常贪财。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和他的好朋友鲍叔牙一块儿合伙做生意，挣了钱以后，他自己总是拿得多，分给鲍叔牙的很少。后来他在齐国做了大官以后，家里面也很有钱，而这些钱估计也来路不正。

《论语》里面曾经有人问孔子说：老师，你说管仲这个人能不能称之为节俭呢？孔子

说：管仲这个人家里面光别墅就有三套，这个人如果都算节俭，那还有谁不算节俭？(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由此可见，管仲的问题很大。但是管仲能力非常突出，他有能力帮助齐国富强，有能力帮助齐桓公称霸。所以曹操就问了这个一个问题，如果你说我的用人标准里面必须要把道德卡得死死的，我非得要用廉洁的人，那么像管仲这样的人，就不能够得到任用，那如果管仲不能得到任用，齐桓公还怎么能够称霸呢？

第二个问题：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渊泽者乎？

这个说的是姜太公的典故。民间传说，姜太公到八十多岁的时候还是默默无闻，空负一身绝学，他就只好在渭水河边钓鱼。曹操就借用这个典故，说在现行的这样一个不合理的评价机制之下，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就像姜太公一样，默默无闻，活到八十多岁都没人知道。

第三个问题：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这个说的是汉朝的开国元勋谋士陈平的典故。陈平足智多谋，为汉朝的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这个人生活作风方面问题就大了。据说陈平是一个美男子，小白脸，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和自己的嫂子私通，这个是违反了人伦道德的。他到了刘邦手下以后，又大肆地贪污受贿，刘邦把当年推荐陈平的推荐人魏无知叫到跟前来，质问他：你怎么给我推荐我这个货色？魏无知反问了一句：您想要我给您推荐的是，道德模范标兵，还是能够打败项羽，夺取天下的人呀？刘邦没好气地说：那肯定是后者啊。魏无知说：这就对了啊，我给您推荐的陈平就是这样的人啊。

曹操借用这个典故做了一个假设，他说假如当年陈平没有遇到过像魏无知这样能够不计较他的小毛病，能够来赏识他，任用他的人，那么他岂不是就要一辈子默默无闻？那当今天下难道就没有像陈平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吗？

最后，曹操给自己的那些做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员提出了要求，他说：“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你们要协助我，要去大力地挖掘那些被埋没起来的人，把这些人也都推荐上来给我用，不管这些人是不是道德上面有问题，都不用管，只要有才，就可以推荐上来给我用。

公元214年，曹操发出了第二道求才令。这一道求才令的核心思想是：对于偏才，不能偏废。

公元217年，曹操下发了第三道求才令。曹操要大力挖掘五大类人才：出身低贱的人，有仇的人，文俗之吏，道德品质有瑕疵的人，比如“盗嫂受金”陈平，道德品质有严重缺陷的人，像战国时期“母死不奔丧”“杀妻求将”的吴起。

中国历史上的求才令很多，但是像曹操这样，公然招聘不仁不孝之徒的，空前绝后。那么，曹操为什么要公开招聘道德败坏的人呢？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动机呢？

招聘也可以是行为艺术

第一，矫枉必须过正。东汉末年过分看重道德，轻视实际能力，道德形式主义化。要想矫正这种不良风气，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故意公开喊出口号，我偏要招聘不仁不孝之徒，我就不看重道德！引发争议，制造噱头。曹操的

求才三令，相当于一钟行为艺术，故意采取了一个相对夸张的表现手法，来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反思。

第二，为自己辩护。曹操是宦官的孙子，被当时的儒家士大夫所看不起。就算曹操做到了曹丞相，但是儒家士大夫们还是把他看成是一个暴发户。曹操也不打算去学习这些士家大族，也来附庸风雅，也来装腔作势地挤进你们所谓的上流社会，没这个打算。曹操采用的是一个相反的手段，我自己不会往上凑，但是我偏要把你们这些人都给拉下马，大家谁都别装。曹操的求才三令，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个性方式找到了一个合理性的依据。你们讲究穿着，要戴礼帽，冠冕堂皇，衣冠楚楚，我偏偏不戴礼帽，我就随便系个头巾，你敢说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吗？你们讲究笑不露齿，那我呢，我偏偏要放声大笑，龇牙咧嘴，把满口的牙都龇出来，你有意见吗？

根据史书记载，曹操曾经有一次在一个高级社交场合的大型宴会上，吃饭的时候哈哈大笑，笑得是前仰后合、手舞足蹈，把整个脸都埋进了杯盘之中，抬起头来的时候，满脸都沾满了米饭粒和菜汤。

第三，为自己的人才政策辩护。为什么你们都说孔融是人才，我却偏偏要杀？就是因为他是伪人才！为什么你们认为道德有问题的人，我却偏偏要用？正是因为他们虽然不符合世俗的人才标准，却符合我的人才标准。

这就有一个问题，曹操实行名法之治，执法严格；这里又说曹操用人不计较小毛病，丁斐犯了贪污罪，曹操从轻发落。这两者之间是不是矛盾的呢？

其实，这两件事情综合起来，我们可以